

從傳統史觀到現代文學觀的轉化

——民國時期關於古代作家的「評傳」和
「事蹟考」寫作

葉 倬 瑋^{*}

摘 要

五四運動以後，文壇興起了替古代作家撰寫「評傳」和「事蹟考」文章的風潮，這些文章吸收了當時的文學觀、以至社會學的觀點，使其呈現相當「現代化」的寫作方式。例如對傳主戀愛事蹟的關注、以個人主義取代倫理教化為方針等；這些研究成果，許多都寫進了文學史，成為今日我們對這些古代文人的定評。若然追蹤這些「評傳」和「事蹟考」的寫作資源，就會發現國故整理的推動，「人的文學」的鼓吹，戀愛論及廚川白村的譯介熱潮，都對這種文章的寫作產生重大影響。於是，我們便會發現這些「評傳」和「事蹟考」，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展示作者對於時代與人生的關懷，及對尋求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價值之關切；本文或能對現代的文學批評價值的形成，提供有意義的觀察角度。

^{*} 作者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暨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副總監。

關鍵詞：評傳、事蹟考、個人主義、傳記文學、文學觀念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Modern Literary Perspective:

A Study on “Critical Biography” and “Deeds
Research” of Classical Literary Writers Written by
Write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euk-wai Yip^{*}

Abstract

There was a trend composing “critical biography” and “deeds research” of classical literary writers during *Mingguo* 民國 perio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se articles absorbed the literary and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s of the time, showing some kinds of modern writing style. For example, many articles concern the love stories of the subject of biography and tend to replace Confucian moralization by individualism in their approaches, etc. Some findings are accepted by literary history afterward and become the general judgment to thos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e Director,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ulture,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lassical writers. By 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which those articles had applied, we could find that the “rearrangement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the urge of “human literature,”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ove theories and Kuriyagawa Hakuson’s love and literary works, had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writing approach of those articles. Therefore, we could conclude that these “critical biography” and “deeds research” articles are signs of the spirit of the age, showing the concern of writers on the contemporary age and their everyday life,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odern values from the research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Having a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se articles, we are allowed to find new angles to review the value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ose valu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It also provides clues for us to rethink the origin of value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reason why such values are being emphasized.

Keywords: critical biography, deeds research, individualism,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literary concept

從傳統史觀到現代文學觀的轉化

——民國時期關於古代作家的「評傳」和 「事蹟考」寫作*

葉 倬 璋

一、引言

本文研究文學觀念的新舊轉化。採用「評傳」和「事蹟考」為切入角度，是因為這類文章先天受傳統史學書寫影響，對傳主有史家的價值判斷，¹當以文學作家為傳主時，事功、道德和文章是最常見的

* 本文屬研究項目「『抒情』概念與民國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以李商隱和黃仲則研究為例」（ECS Ref:28605415）的階段性成果之一，計劃得到香港研究資助局（RGC）「傑出青年學者計劃」（Early Career Scheme）撥款支持。論文得到兩位匿名評審提供寶貴的修訂建議，對本文成功出刊幫助尤大，謹此致謝。

¹ 歷代關於古代傳記論述頗多，可參吳訥《文章辨體》，他申述了由《史記》到後代小傳、家傳、外傳的演化過程及原因，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49。又，倫敦大學但尼斯·推及特（Denis Twitchett）教授在《中國歷史人物論集》撰有〈中國傳記的幾個問題〉一文，綜述了中國古代傳記的形式、內容、編輯經過和思想傾向，是比較全面地考察傳記性質和生成的文章。該文原為英文，撰於1960年，為*Confucian Personalities*的一章，後來由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於1962年編譯成中文，後來再由張端穗於1988年補正，發表在《東海中文學報》上。參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編譯：《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62

評價準則。以此為參照，本文關注的文本對傳主持什麼評價準則，將是本文的首要任務。同時，傳記文學在清末民初一直蘊釀，後來成為重要的創作體裁。本文討論之「評傳」和「事蹟考」文本，撰寫高峰期在20世紀的20、30年代，²正與胡適（1891-1962）、郁達夫（1896-1945）等大力推動傳記文學同時，故可以看作是傳記文學的副文類（Sub-genre）。若視這些文本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材料，傳記文學的理論如何影響其觀點以至價值取向，也是本文關注的問題。本文認為這批「評傳」和「事蹟考」傳遞的文學觀念，反映著當時的文藝思潮，也影響了古代文學的研究。換言之，現代之古代文學研究的批評價值之形成，是本文的最終關懷。

實現以上構想必須克服以下難題：如何判斷從眾多文本歸納出來的特點，乃受當時文藝思潮影響下的結果。文本的寫作語境紛紜，文本作者的學術訓練、個人經驗都能左右文本的寫作方針。再者，文本作者未必具備完整的文體意識，他們未必主動參照及回應歷來的史傳寫法，以創製新的文體和推揚有別於歷來史傳的價值；也就是說，寫作現象的描述並不足以判定寫作現象的重要性。於是，筆者刻意模糊了史傳和傳記文學的界線，二者的特質，都可以援入討論範圍，亦即以「評傳」和「事蹟考」為方法，而不是史傳和傳記文學，作者的共通目標是表現個人。此外，比較史傳也是必須的，不然將難以發現其價值判斷之新在哪裡。另一方面，本文將研究範圍劃定在古代文人，也有意突顯這些文本在文學價值上如何迥異於以往，即如何從個人本

年），頁28-45。及張瑞穗：〈中國傳記的一些問題〉，《東海中文學報》第8期（1988年7月），頁105-116。又，關於古代傳記文的辨體討論，可參黃自鴻、胡梓穎：〈傳記與辨體觀——內部衝突的分類過程〉，《漢學研究》第34卷第1期（2016年3月），頁95-121。

² 筆者從「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11輯）、「民國晚清大報庫」資料庫中檢出超過一百篇關於古代文學家的「評傳」及「事蹟考」文章，年份由1923年到1948年。見「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1-11輯」，網址：<http://www.cnbksy.cn>，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晚清民國大報庫」，網址：<http://db.ersjk.co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位出發去追問文學的價值。

二、文人傳記寫作方向的變化

(一)「評傳」和「事蹟考」的淵源與古代文人傳記的 寫作法則

20世紀上半葉，傳記文學得到胡適、郁達夫、沈從文(1902-1988)等人的關注，他們仿效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等人撰寫自傳，亦寫了一些名人傳記。³由於得到胡適等新文學推手的大力鼓吹，傳記文學開始風行；到了40年代初，更有學者發起「現代人自傳運動」。⁴胡適等人積極推廣傳記文學的動機，緣自有感於傳記文學在中國的發展遠較西方落後。⁵學界亦多提倡要多為名人作傳，甚至認為傳記文學能夠有喚起民族性的大用；⁶故這時可以發現大量軍政界的

³ 胡適留美時已感嘆中國沒有像西歐那種傳記文學，他推動傳記文學的書寫，自己亦多所創作，包括《四十自述》(1930-1932年於《新月》分六期刊出)、〈中國女杰王昭君傳〉(1908年刊於《競業旬報》)、〈李超傳〉(1919年刊於《新潮》)等；郁達夫有《日記九種》，坦率記述跟王映霞的戀愛，又有〈什麼是傳記文學？〉；沈從文於1932年也寫了《從文自傳》；郭沫若的自傳成果更是豐碩，有《我的童年》(此書有多個版本，最初在1929年書名為《我的幼年》，由光華書局出版)、《我的學生時代》(1942年刊於《野草》)、《創造十年》(1932年由現代書局出版)等。

⁴ 虞洽卿、袁禮敦等：〈現代人自傳運動緣起〉，《青年文會》第2卷第10期，1941年，頁691。二人又另擬簡章以作呼籲。

⁵ 胡適《四十自述》的自序一開始就說：「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胡適：《四十自述》第1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37年)，頁1。朱東潤說：「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盪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朱東潤：〈張居正大傳序〉，《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第1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頁4。

⁶ 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學界就更鼓吹傳記寫作，認為記敘偉人和英雄的事蹟，能夠激起民族義憤。許君遠：〈論傳記文學〉，《東方雜誌》第39卷

人物傳記。關於30年代傳記文學被大力推動之時，胡適如何從理論和實踐支持這股熱潮，傳記文學的重要作家與作品等課題，當今學界已有充分的探討。⁷

「評傳」是「新體傳記」中「他傳」的一種。梁啟超（1873-1929）曾批評傳統史家之春秋筆法，認為孔子（551-479BC）之述春秋，不是為了褒貶史事，而是在言論不自由的時代，「自發表其政見」。⁸ 他標舉希臘史學家布爾特奇（Plutarch，46-120）的《英雄傳》和英國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前者「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後者「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⁹ 認為這是史傳的寫作典範。後來，他撰寫了兩部長篇傳記《南海康先生傳》和《李鴻章》，被認為是他告別傳統傳記體式、轉向師法西方「新體傳記」的轉捩點。「新體傳記」在作者主觀議論上，較傳統傳記顯著增加，梁稱之為「專傳」，論者認為這是後來「評傳」的雛型。¹⁰ 自此以後，報刊上便不斷有「評傳」刊載，傳主遍及古今中外的文化界、軍政界人物。

早在宋代已有「事蹟考」，它是行誼、行狀的同類文章；例如元代鈔本之《平巢事蹟考》，就敘述了唐僖宗（862-888）時黃巢之亂

第3期，1943年，頁52。

⁷ 可參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頁1-13；劉海霞：《前期創造社同人自傳文本研究——以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郭久麟：《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7-16、頁51-105；謝昭新：〈論三十年代傳記文學理念與自傳寫作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5期，頁145-160；卞兆明：〈論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創作〉，《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頁149-152；辜也平：〈論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建構之流脈〉，《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20-38。

⁸ 中國之新民：〈新史學·懸談二·論書法〉，《新民叢報》匯編2第6期，1900年，頁1。

⁹ 中國之新民：〈新史學·懸談二·論書法〉，頁5。

¹⁰ 胡全章：〈梁啟超與20世紀初年新體傳記的興盛〉，《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頁166。

的發生和平亂經過。¹¹ 清代有不少關於重要學術人物的「事蹟考」，如胡元儀（1848-1908）《北海三考》六卷，卷一、卷二就題為「事蹟考」，考述東漢大儒鄭玄（127-200）的仕宦和遊歷。¹² 又，嚴可均（1762-1843）亦有〈許君事蹟考〉，就東漢學者許慎（58-148）的仕途考察，清人桂文燦（1823-1884）認為嚴氏此文「可補范史之缺餘」，¹³ 嚴氏自己亦自言撰寫緣起是許慎事蹟「本傳所載寥寥不備」。¹⁴ 可見「補史之缺」乃清人為學者撰寫「事蹟考」之要旨。很明顯，這是支援傳統「儒家史學」（Confucian historiography）的文章，但這並不暗示其為政權服務，或者必然代表官方立場。¹⁵ 這種史學觀念指導著「事蹟考」寫作的必須跟事功有關，使其能彰顯傳主的憂患意識，也成為傳統「儒家史學」一直占據話語權的助力。

不得不指出，受「儒家史學」影響，古代傳記的評價準則都呈現著對儒家價值的呼應。吳訥（1372-1457）《文章辨體》指傳記寫作有「忠孝才德，慮其湮沒弗白」和「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之動機，¹⁶ 此說固然有代表性。即使查看諸種「文藝傳」、「文苑傳」，對文學家的寫作和評騭，都幾乎有一定程式。如《新唐書》寫李白的事跡是以皇帝為價值判斷的立場，「帝賜食」、「帝愛其才」、「帝欲官白」等語言組構成為皇帝御定的「天才」話語；而所敘的不協權貴，及晚年

¹¹ 撰人不詳：《平巢事蹟考》，收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¹² 胡元儀：《北海三考》，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619-645。

¹³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

¹⁴ 嚴可均：〈許君事蹟考〉，收於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30，頁625。

¹⁵ 汪榮祖指出西方學界對「儒家史學」有誤解，他認為史家未必會為逢迎政權而扭曲史職。汪榮祖：〈西方史家對所謂「儒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臺大歷史學報》第27期（2001年6月），頁125-149。

¹⁶ 吳訥認為自《史記》開創列傳，後來之史傳便沿其法。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頁49。

之仕隱，皆未離開這話語。¹⁷ 曾五次修訂始定稿的《明史》，傳何景明（1483-1521）時亦較多著墨其敢於上書直言的舉動，以顯其不畏權奸、志操耿介的性格。¹⁸ 即使如朱彝尊（1629-1709）撰的私傳〈王冕傳〉，也是如此寫法，突出王冕（1287-1359）之高才及志潔。¹⁹ 因此，事蹟的選擇呼應著儒家價值的傳揚，以此來理解傳主就很難不有所偏了。即使傳主是以文藝為主要貢獻的文學家，也不能使其遊離於官方認許的儒家價值外。所以，以這種寫作程式比對民國時期的「評傳」和「事蹟考」，就很清楚地看到古今側重點之不同。

就筆者所見，20世紀20年代初，陸侃如（1903-1978）〈宋玉賦考〉（《宋玉評傳》的一節，1923）及〈王勃評傳〉（1923）、游國恩（1899-1978）〈司馬相如評傳〉（1923）等「評傳」，用流暢的學術語言，評述傳主的文學成就。這種寫法已突破了古代傳記的限囿；但更受矚目的，卻是20年代中開始大量出現撰寫文學家私生活的「評傳」和「事蹟考」。筆者認為，這些文章真正反映當時學人對文學觀念現代化的熱切追慕。

（二）新體「評傳」和「事蹟考」的關注點

從整體的書寫策略看，可歸納如下：

第一，事功的簡化或功能調整。不同於傳統史傳文，這些「評傳」和「事蹟考」對傳主的事功大都刻意簡化，例如胡雲翼（1906-1965）〈北宋四大詞人評傳〉將歐陽脩（1007-1072）和蘇軾（1037-1101）的生平事功略去不談，高譽廣〈詞人歐陽修評傳〉亦是這樣；²⁰ 羅慕華

¹⁷ 歐陽脩、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202〈列傳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中·李白〉，頁5762-5764。

¹⁸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86〈列傳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何景明〉，頁7394-7350。

¹⁹ 朱彝尊：《曝書亭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64〈王冕傳〉，頁358-359。

²⁰ 高譽廣：〈詞人歐陽修評傳〉，《無錫中學校刊》第1卷第4期，1930年，

〈納蘭性德〉七篇，只在首篇用了兩小段談他的家世及生平，其餘主要介紹他的情感生活和詞作風格；²¹ 章衣萍（1902-1947）《黃仲則評傳》對黃仲則（1749-1783）在北京求仕和結交名宦的經歷簡化爲一段，而絕大部分篇幅談他作品反映出來的窮困和愛情。²² 何壽慈〈韋莊評傳〉對傳主韋莊（826-910）的求仕生涯寫得詳細，但每段經歷（包括遊踪和應考）的證據都是其詩詞作品；²³ 甚至郭德諾〈李後主評傳〉也沒有就其政治發揮，反而設一章談後主的死，認爲他是爲作品犧牲了性命。²⁴ 傳主的事功要麼被簡化，要麼被調整成爲印證文學作品風格的證據。因此，無論傳主之事功成或不成，都無礙其文學價值。

第二，傳主傾向情感豐富細膩。自然，傳主的選擇爲了適應預設的書寫策略，有些熱門傳主甚至有好幾篇「評傳」或「事蹟考」。例如李清照（1084-1155）就有最少四篇、納蘭性德（1655-1685）最少有六篇、陸游（1125-1210）最少四篇、魚玄機（844-871）、李煜（937-978）及黃仲則最少有三篇、李商隱（813-858）最少兩篇等。「評傳」和「事蹟考」都強調這些傳主能體現情感文學的特點，傳主是不是在該段歷史中的重要人物，反而不怎麼考慮。

這些「評傳」和「事蹟考」顯示出對傳主的戀愛和婚姻生活之強烈關注，不少甚至以「戀愛事蹟考」命名。²⁵ 若考其肇端，這是由兩位

頁88-96。

²¹ 七篇分刊於《晨報副刊》1927年10月8日，頁13；1927年10月10日，頁15-16；1927年10月12日，頁17；1927年10月14日，頁21；1927年10月15日，頁23，及1927年10月17日，頁25。

²² 上下兩篇，分別爲章依萍：〈清代詩人黃仲則評傳〉，《學林雜誌》第1卷12期，1925年6月，頁1-16；第2卷2期，1925年11月，頁1-14。

²³ 何壽慈：〈韋莊評傳〉，《中國文學季刊》創刊號，1929年8月，頁1-21。

²⁴ 郭德諾：〈李後主評傳〉，《文學年報》第1期，1932年，頁36。

²⁵ 例如蘇雪林〈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事蹟考〉（1926年刊於《回溯》）、〈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1930-1931年刊於《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甘禮俊〈唐女冠魚玄機戀愛事蹟考證〉（1931年刊於《明強》）、陶鈺〈鄭板橋戀愛事蹟考〉（1937年刊於《實報半月刊》）、譚正璧〈洛神賦

不到二十歲的學子，在1924-1925年間接連發表的兩篇李清照「評傳」掀開序幕的。其中一篇乃胡雲翼〈李清照評傳〉，該文以絕大篇幅，描寫李清照的婚姻生活。他尤其著重為易安的作品鋪排對應的心理狀態，例如：

青春的年華，是這般容易消逝的；甜密的生涯，已成為過往的回憶了。當易安四十六歲那年，明誠為他的母喪，奔喪到金陵，易安很凄苦的度她孤寂的生活。金人之陷青州，又把她們十餘屋極珍重的心血的藏書燒掉了，使她只有苦笑。而生父之遭罷免，更是使她悲憤無涯。她的詩有，「何況人間父子情」的熱淚。一方神馳于明誠，一方又眷懷乎故鄉；她有一首春殘詩，就是抒寫鄉愁的。「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裡梳妝恨髮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²⁶

李清照〈春殘詩〉，學界多繫於紹興二年（1132）趙明誠（1081-1129）死後兩年多的春天，而不是靖康二年（1127）三月。但胡雲翼以夫妻分離為主，鄉愁和家國之悲為輔，來深化這首詩所積鬱的深愁，評價角度就跟古代史傳不同。至於李清照的改嫁爭議，這篇「評傳」認為是謬妄之說，然後以抒情之筆作結。另一篇則是較胡雲翼小一歲的張壽林（1907-?）的〈易安居士評傳〉，此文刊在胡氏文章之前，於1924年12月至1925年1月的《京報》附設之《文學週刊》分四期連載。這部「評傳」在李清照事蹟方面寫得較胡氏詳盡，也同樣以極多篇幅寫其婚姻生活，如趙李夫婦如何賞購古玩、比賽詩詞、共研金石等，也多以抒情筆法概其人生歷程和作品情感特色。²⁷

主角戀事蹟考〉（1943年刊於《萬象》）、〈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蹟考〉（1945年刊於《大眾》）等。

²⁶ 胡雲翼：〈李清照評傳〉，《晨報副刊·藝林旬刊》第13期，1925年8月，頁9。原文「回憶」作「迴憶」，本文作者訂正。

²⁷ 張壽林：〈易安居士評傳〉，《京報附設之第六種週刊·文學週刊》第27期，1925年7月，頁1-4。

若果因為李清照是女性作家，她與趙明誠的夫唱婦隨流傳千古，而視這種寫法為理所當然的話，以下兩個例子，就能證實這種寫法並非偶然。首先是章衣萍的〈清代詩人黃仲則評傳〉，此文與張、胡二文的刊登時間差不多，分兩期在《學林雜誌》上刊完。上篇述黃仲則生平際遇，下篇論其詩詞成就。這篇「評傳」不滿足於清代對黃仲則「薄命詩人」的評價，認為他是「兒女文學的聖手」，並用其愛情詩作為抒情詩的唯一範疇，大加褒揚。黃仲則的情史並未見於清人撰寫的傳記，僅在少數筆記對他的戀人身分和艷情詩〈綺懷〉之本事作過揣測，而他的情詩也並沒得到清人普遍肯定。1922年，郁達夫小說〈采石磯〉大量引用了黃仲則的情詩，並創作了黃仲則少年時代的一次悲慘愛情經歷，作為這些情詩的本事。郁達夫的創造，得到章衣萍的繼承，章氏利用黃仲則的情詞作為這段「情史」的註腳，在評論其文學成就時又大量引用情詩情詞作為例子，²⁸印證其「兒女文學的聖手」之說。他說：

這幾首抒情詩真是又宛轉，又細膩，又悱切動人！我們且不管「綺懷」中所戀是什麼女子，當然又是「感舊」裡的舊相思，（也許不是！）但就詩論詩，這幾首詩中竟不少千古不滅的名句！記得胡適之先生曾說過：「抒情詩最易流入輕薄，抒情詩而帶著幾分悲哀，詩之品格便提高了」。仲則的情詩之所以能這樣動人，就因為他的情史受過悲哀的洗禮！²⁹

以「愛情」代表「情感」，從「經歷」提煉「情感」，將「情感」作為文學評價的標準；經過幾重置換，被發掘出來的「情史」就不再是一些無關痛癢的小故事，而是直接支撐著「情感文藝」或者「兒女文學

²⁸ 關於黃仲則在清代的評價，和如何得到郁達夫、章衣萍等人的重塑，可參葉倬璋：〈抒情傳統與現代——黃仲則詩在民國〉，《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頁181-210。

²⁹ 章衣萍：〈清代詩人黃仲則評傳（下）〉，頁62-63。

的聖手」的支柱。

另一個例子是蘇雪林（1897-1999）關於李商隱的研究，1927年北新書局出版《李義山戀愛事蹟考》。³⁰蘇氏此書發掘了李商隱兩段戀愛故事，包括女道士宋華陽，和宮嬪飛鸞、輕鳳。她認為李商隱的無題諸作，和一些晦澀難解的詩，除了部分托言身世外，「其餘的都是描寫他一生的奇遇和戀愛的事迹」。³¹李商隱寫得這麼難懂，是因為他戀愛的對象不是尋常女子，如果事發，會令對方名譽受破壞和有生命危險，所以要造出一大批的「詩謎」，教人自己去猜。以往研究李商隱詩歌者，一直有以戀愛對象作為一種揣測；他的無題詩，又有持寓託說和悼亡妻子王氏等說法，但這些都僅備一說。蘇雪林此書充分發揮其想像力，為李商隱詩解碼及重新拼湊，例如以〈西溪〉、〈曲池〉等詩，斷定李商隱與宮嬪相戀，甚至連偷歡的過程亦井然有序地臚列出來：

1. 夜間至窗下用瑟絃玉珂為暗號。
2. 因隔院尚有文宗楊妃等，不敢驚動，故上下時躡足屏聲。
3. 進由斜門，幽會則在小閣中。為防人衝進起見，有時下鎖。
4. 天微明則潛出。
5. 義山尚有公事待辦（開成四年釋褐為祕書省校郎）故晨即赴省。³²

又以〈深宮〉、〈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連讀，演繹成：

「那知為雨為雲處，祇有高唐十二峰」言只有曲江離宮可為幽會之地。返宮後則沒有機會了。但義山在宮牆外巡視，徘徊，

³⁰ 蘇氏書序中提到，此書的前身是一篇名為〈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事蹟考〉的文章，是張群鶴採納她的意見，發表在東吳大學士五週紀念會的刊物《回溯》上。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上海：北新書局，1927年），頁1。

³¹ 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頁4。

³² 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頁62-63。

雖身無羽翼飛入宮庭中。但兩個情人心心相印，有如靈犀文理之可通。³³

諸如此類，將李商隱的戀愛史「完整」地構寫出來，時、地、人都「考據」落實了。蘇氏此書較前人突破的是：她不是在做一首首詩的箋解，所用的詩篇也遠遠超出了以往被認為有關情事的範圍；她組織這些能夠相互照應、相互詮解的詩例，使之成為戀愛故事的追述。³⁴所以，讀這部書就如讀文藝作品。當時引起的討論甚多，有書藉介紹謂指該書是「一本文藝化的史學著作，她的文字實在是流利而雋逸的」，³⁵讚譽之餘也道出了該書的文藝特點（literary features）。

破格的寫法自然受到一些批評，³⁶但更值得深思的，卻是由此而引發的戀愛史研究潮。例如譚正璧（1901-1991）的〈「洛神賦」主角戀愛事蹟考〉（1944）、〈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蹟考〉（1945）等。最積極學習蘇雪林這種寫法的是邱竹師的〈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1929），他不僅繼承了章衣萍〈黃仲則評傳〉的判斷，還發展了蘇雪林的想像力。文章重新組織了黃仲則的詩詞創作次序，將他的戀愛史分為「戀期」和「失戀期」，以下再分為「初戀期」、「熱戀期」、「追憶

³³ 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頁65。

³⁴ 例如她認為〈無題二首·鳳尾香羅薄幾重〉其一寫愛人返宮，其二「重幃深下莫愁堂」寫愛人歸後之惆悵，只餘相思；〈深宮〉：「豈知為雨為雲處，祇有高唐十二峰」，暗示只有曲江離宮可為幽會之地，愛人返宮了則機會沒有了。〈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寫二人相隔但相知；〈無題·幸會東城宴未迴〉：「梁家宅裡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表示義山與宮嬪之關係；〈無題二首·來是空言去絕蹤〉暗示人在深宮，不能一通款曲，義山入宮之機會更無可能。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頁63-67。

³⁵ 私立東吳大學同學會編：〈著述介紹·蘇雪林教授·《李義山戀愛事蹟攷證》〉，《老少年》第5卷第2期，1928年，頁7。

³⁶ 例如張蔭麟曾以筆名素癡撰書評謂：「作者懸斷之『事蹟』，多從詩中推出，什九缺乏歷史的根據。雖其自序中謂此不過為一種假設，而正文中處處用肯定口氣，動謂已得證明。蓋其想像之敏活，遠遠超過其判斷之謹嚴也。……此書最大之功用，蓋在使人解頤矣。」素癡：〈評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國民週報》第5卷第50期，1928年，頁1。

期」和「證情期」。此外，邱竹師更利用標點符號，將黃仲則的詞作看成一段段的情人對話，將黃仲則和情人的相處仔細描畫出來。甚至連何時何地有性行爲也推究出來。如：

哟！春光漏了，不知道此時這位詩人的心情怎樣？又如：
 「顫提裙衩步蒼苔；首驚回；『甚時來？昨宵風露爲誰捱？』念
 我一番寒澈骨，分半角錦衾，偎。」
 「端相一霎太津津；乍微嗔，卻回身；人間天上，此景最消
 魂；『我戀卿卿，卿自會；聊戀我，是何因？』」〈江城子〉
 他倆自這番以後，便噓寒問暖，朝夕殷勤。³⁷

這樣的「考證」，就極像在寫小說。

此外，蘇雪林《李義山戀愛事蹟考》對「無題」詩和〈錦瑟〉的重視亦得到回應，如譚正璧〈李義山詩的鑰匙：錦瑟詩〉（1943年）直接援用了她的說法，將〈錦瑟〉與盧氏宮嬪的關係仔細申述了一次。³⁸1933年，張振珮（1911-1988）〈李義山評傳〉批評了蘇氏的書，說：「她輕輕把千古定論推翻，以成全她那戀愛事跡的推斷」、「論證的根據是太淺薄了」。³⁹然而，張氏也有論述李商隱對王氏的戀愛：

但四海之大，權貴之多，何以獨獨要往依王茂元呢？在這裡我有一個重要的發現，我以為義山赴涇原投依茂元，全由於對他女兒的愛戀，義山在娶王氏女之前，曾有一段神經過敏的單戀生活。⁴⁰

³⁷ 邱竹師：〈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頁11-12。

³⁸ 譚正璧該文稱讚蘇氏該著說：「因了他的戀愛事跡被人發掘得全然暴露，於是不獨首首無題詩都有了適當的解釋，而最稱難解的錦瑟詩也藉此得以迎刃而解了。」見譚正璧：〈李義山詩的鑰匙——錦瑟詩〉，《萬歲》第2卷第1期，1943年，頁36。

³⁹ 張振珮：〈李義山評傳（中篇）〉，《學風（安慶）》第3卷第8期，1933年，頁30。

⁴⁰ 張振珮：〈李義山評傳（中篇）〉，頁31。

然後結合本集資料，考出義山這段戀史，也以意逆志地推求李詩的別有所指，更指其單戀達五六年之久。這種猜想和論說方法到底又離蘇雪林多遠呢？

於是，新的「以人爲本位」的古代文學研究便在這種寫作風氣下漸漸成形。一直以來，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都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主要方法，雖然「由人出發」，但論述終點是「世」或「志」，也都圈定某些值得褒揚或者必須貶抑的價值，例如忠義、博學等。使一些作品可因詩人之性情品德而上升至經典高度，也可以因詩人之放浪行爲而下降到需要「刪」和「焚」的地步。⁴¹ 民國時期的「評傳」和「事蹟考」，對作家私生活的特定研究，表面上過度關注在言情和戀愛範疇，似乎較以往之知人論世更狹隘；但由於這些範疇都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禁區，這反而解開了長久以來的禁鎖。這些富有想像色彩的論說，固然可以質疑其真實性；但更值得追問的是，爲什麼研究古人的文學和行跡會在這段時期、出現這樣的一種趨向？文本的寫作語境將給予值得深思的答案。

三、寫作語境的三方交纏

(一) 國故整理下對撰寫古人傳記的推動

上世紀20年代，文學研究會倡導整理國故。鄭振鐸(1898-1958)於1922年〈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提到從事作家研究，要研究作家在文學史的地位和影響、他的性質、作品風格、人生觀等，也須細細觀察。⁴² 汪馥泉(1900-1959)回應的文章也提到撰寫和考證「作者傳

⁴¹ 例如清人研究李商隱，就有認爲其無題、〈錦瑟〉等詩意隱晦的詩是寄寓其志大才高但不得志的懷抱，因而評價甚高；清人也有因爲黃仲則在北京流連妓院，和伶人廝混，而貶低他的綺艷詩，如〈綺懷十六首〉、〈感舊〉等，在清代的黃仲則詩歌選本就不獲選入，翁方綱曾說黃仲則詩必須嚴刪然後可傳。

⁴² 西諦：〈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文學旬刊》第51期，1922年10月，

記」是重要的整理古代詩歌方法。⁴³ 王伯祥(1890-1975)也高呼除了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家，也應介紹中國的文學作家。⁴⁴ 另外，也有認為介紹中國作家的真善美，是積極的整理國故方法，及呼應了新文學的運動。⁴⁵ 但這些建議大都較寬泛，未有具體說明哪些課題能夠滿足這些理念。1927年，鄭振鐸撰寫〈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長文，⁴⁶ 其中「未經墾殖的大荒原」所開列的作家研究所應撰寫的書籍，就幾乎都在本文的「評傳」和「事蹟考」範圍內實現了：

表一：鄭振鐸開列的作家研究應該撰寫的書例與民國時期的「評傳」及「事蹟考」對照表

鄭振鐸認為應該撰寫的作家研究(1927年)	民國時期的「評傳」和「事蹟考」
曹植： 《曹植的生平與著作》、《曹植的詩》、《曹植的藝術及其影響》、《曹植與洛神之傳說》	沈達材〈曹植評傳〉(1936年) 譚正璧〈「洛神賦」主角戀愛事蹟考〉(1943年)
李白： 《李白的生平與著作》、《李白的遊踪》、《李白與游仙的思想》、《李白與酒》、《李白與他同時代者》	劉奇芳〈李白評傳〉(1934年) 張恩榮〈李謫仙評傳〉(1934年) 王風〈大詩人李白評傳〉(1940年)

頁1-2。

⁴³ 馥泉：〈整理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見及其他〉，《文學旬刊》第53期，1922年10月，頁1。

⁴⁴ 王伯祥：〈國故的地位〉，《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頁134-135。

⁴⁵ 余祥森：〈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頁135-138。

⁴⁶ 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原載《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上冊，1927年6月。本文引自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香港：古文書局，1970年)，頁1135-1163。

杜甫： 《杜甫傳》、《杜甫的時代及其作品》、《杜甫的作品及其影響》、《杜甫及其詩派》、《杜甫的思想》、《杜甫的敘事詩》	高商一究研股〈杜甫評傳〉 (1934年)
關漢卿： 《關漢卿及其雜劇》、《關漢卿的藝術與思想》、《關漢卿及其時代》	丘祥旒〈關漢卿評傳〉(1933年)
湯顯祖： 《湯顯祖及其四夢》、《湯顯祖的思想》、《湯顯祖之著作及其影響》	張再蘇〈鄉賢湯顯祖先生傳評〉 (1935年)

鄭振鐸所列只是舉隅，他說最少有百個以上的大作家需要特殊研究，而以往的年譜，則只能作為參考資料而不是研究結果。他對國故的整理方向主要是考證、藝術和思想方面，⁴⁷ 沒有直接論及本文所述這些文章的關注點。上表所列的「評傳」和「事蹟考」，雖然看似能和鄭振鐸所列的作家對應，似乎能證明國故整理運動對「評傳」和「事蹟考」有指導影響。但若細看諸篇內容，就會發現以下情況：既有跟從鄭振鐸等人對國故整理的意見而寫的，如沈達材、王風、丘祥旒和張再蘇的文章就以傳主的文藝成就為重點；也有大致採用傳統傳記寫法，而援入當時流行的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作評價，如高商一究研股〈杜甫評傳〉也是按作者小史、背景、文學主張和思想等部分撰寫，但該文認為杜甫 (712-770) 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之平民的革命詩人」，欣賞杜甫的「非戰思想」及直言時事的人格，認為他是忠於藝術、為人生而藝術的人。⁴⁸ 又如張恩榮〈李謫仙評傳〉認為李白 (701-762) 是「厭世且笑傲社會的浪漫酒徒」，但他詩歌反映出來的

⁴⁷ 他在同一篇文章內盛讚胡適〈紅樓夢考證〉、〈水滸傳考證〉，認為是新路、正路；他也評論金聖嘆之文學批評，認為金氏雖拈出《水滸》、《西廂》，但僅關注文法，對其藝術和思想真價，都未有探求。

⁴⁸ 高商一究研股：〈杜甫評傳〉，《稽山學生》1934年1月號，頁62-66。

人生觀，是「凡事祇須求適情爲目的」，「開後人解放的門徑」，並得到「他生逢濁世，我想能如他一般享些快樂，是最聰明的了！如杜少陵徒悲傷抑鬱，勞心傷神，又有何裨益呵？」的感嘆。⁴⁹當然，更少不了接受20年代對傳主情感世界的關注，寫出具抒情特點的「評傳」和「事蹟考」。例如劉奇芳〈李白評傳〉本來也介紹李白的生平和詩歌成就，但文章的論述卻流向對李白人格及其「貪花戀色」作品的批評。⁵⁰譚正璧的〈「洛神賦」主角戀愛事蹟考〉更加由〈洛神賦〉的本事研究，跑到曹丕（187-226）、曹植（192-232）和甄宓（183-221）的三角戀事「考證」上，他以《三國志·魏書》載曹丕、曹叡（204-239）等人隨曹操（155-220）東征，甄妃因病留鄴但「顏色豐盈」之事，疑心曹植當時也留鄴，所以二人正好私會。然後又認爲甄宓屢勸曹丕廣納妾媵，是因爲她愛戀曹植，故希望以此避免和曹丕太接近。譚又指曹植爲了愛戀而消沉，以致政治上的失敗。⁵¹

（二）「人的文學」的呼召

胡適提出〈文學改良芻議〉後，周作人（1885-1967）於1918年12月發表〈人的文學〉，認爲「人」是『從動物』進化的』及「從動物『進化』的」，所以肯定「人」，就必須肯定靈肉合一。他主張的人道主義，是人人由個人做起，唯愛己才能愛人。至於「人的文學」，他申述：

（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二）是側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⁵²

⁴⁹ 張恩榮：〈李謫仙評傳〉，《一中月刊》1934年6月卷，頁32。

⁵⁰ 劉奇芳：〈李白評傳〉，《五華一中月刊》1934年6月卷，頁15-17。

⁵¹ 譚雯：〈「洛神賦」主角戀愛事蹟考〉，《萬象》第2卷第8期，1943年，頁24-35。

⁵² 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頁578-579。

而「絕好的人的文學」，包括「兩性的愛」和「親子的愛」。這些都是我們本有的部分，只是以前未有發現而已。周氏之論的偏狹，夏志清（1921-2013）已曾批評過。⁵³ 但不難看到，這些主張跟20年代的「評傳」和「事蹟考」的書寫方針是多麼的配合。不少文章體現了對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推崇，溢出了鄭振鐸等人所設置的國故整理方法和預期目標，流向當時流行的各種價值。本文認為：「評傳」和「事蹟考」寫作風潮是從「人的文學」框架下發展出來的，不僅爲了「執行」整理國故的「任務」，還爲了重新思考人的思想如何從舊社會的教條主義下掙脫出來。於是，個人情感在新的評價系統裡就得到較優先的位置。

這就解釋一個有趣現象：爲何大詩人杜甫，在這時期的「評傳」和「事蹟考」風潮中竟然僅得一篇「評傳」。其實杜甫的研究在民國時期從未間斷，也是當時國學知識的重要推介部分，⁵⁴ 他的作品也有被譯成英文，⁵⁵ 其非戰思想的研究，也能應和著當時的反戰思潮。但在

有學者從周作人對古希臘羅馬文學的鍾情，分析周作人「人的文學」的來源，並指出他的主張並非悲天憫人的慈善主義，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耿傳明：《決絕與眷戀：清末民初社會心態與文學轉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17-335。

⁵³ 夏志清〈革命文學〉曾批評周作人「人的文學」主張偏狹，指出西方文學名著不盡是個人主義的文學。夏志清：《人的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79。

⁵⁴ 如汪靜之：〈平民詩人杜甫〉，《學林》第2卷第5期，1926年，頁82-113。聞一多名作〈杜甫〉，1928年在《新月》發表。聞一多：〈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頁7-22。郭紹虞的〈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也撰於1932年。見郭紹虞：〈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文學年報》第1期，1932年，頁1-26。即使章衣萍也曾撰寫《杜甫》一書，向小朋友介紹「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使人知道他是一個平民詩人和寫實詩人。章衣萍：《杜甫》（上海：兒童書局，1935年）。王雲五主編的「學生國學叢書」亦收傅東華選註的《杜甫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⁵⁵ 如辜鴻銘譯：〈贈衛八處士〉，《英語周刊》第250期，1920年，頁697。Amy Lowell, Florence Ayscough 譯：〈石壕吏〉。Amy Lowell, "A Chinese Poem Translated: The Recruiting Officers," trans. Florence Ayscough, *Chung Hwa English Weekly* 6, no. 152 (1922): 530. Amy Lowell (民國時譯名羅愛兒，1874-1925)，是美國「意象派」的重要詩人，Florence Wheelock

「評傳」和「事蹟考」普遍著力張揚個人主義時，杜甫長久以來一直身處文學研究的中心位置，其感時憂國忠君仁厚早成定論，年譜和行蹟亦已有豐碩成果，杜甫一生僅有楊氏一妻，沒有戀事傳聞。這樣的人物，自然較難進入個人主義範疇，不容易得到「評傳」和「事蹟考」作者的歡迎。1922年，梁啟超在詩學研究會演講〈情聖杜甫〉，他所言之「情聖」，是指杜甫對一般人有情、對朋友、弟妹、家庭、乃至國家有情，杜甫又能將諸種不同性質之情緒，歸攏一篇而得調和之美，也能用簡鍊語句寫情。⁵⁶ 梁之情指涉範圍很闊，基本上含括了杜甫詩的諸種題材，跟本文所舉諸例之狹義於情感生活不同。

不過，要解釋這些作者為何以喜歡以戀愛事蹟為寫作焦點，還得援入當時的戀愛論熱潮。

(三) 廚川白村及戀愛論的研究熱潮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知識青年對愛情哲學有熱切關注。1921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1868-1940）聘請了剛在法國里昂大學博士畢業的張競生（1888-1970），任哲學系教授。⁵⁷ 張競生在北京大學講「美的人生觀」，後來講義輯印成書，受到廣泛關注。而在1923

Ayscough（1878-1942），漢學家。二人合作出版了漢詩翻譯集《松花箋》（*Fir-Flower Tablets: Poems From the Chinese*）。關於這部詩選的撰作緣起和體例，可參豐華膽：〈艾米·洛厄爾與中國詩〉，《外國文學研究》1983年第4期，頁121-123。及葛民峰、李延林：〈艾米·洛威爾漢詩譯集《松花箋》及仿中國詩研究〉，《西安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頁107-112。

⁵⁶ 梁啟超的演講稿後來刊登在《紹興教育界》第1卷第3期，1922年，頁1-15，亦載《晨報副鑄》，1922年5月28及29日。

⁵⁷ 張競生是民國時期的性育學家，曾因《性史》出版風波而離開北大。他的愛情討論大膽前衛，當時被目為「文妖」。關於張競生事蹟、主張和學術貢獻，可參王鳴劍：〈張競生的性學普及之旅——兼論與梁實秋的性學論爭〉，《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第131期（2011年3月），頁74-77。及《張競生文集》的兩篇序文，即周彥文：〈張競生：中國出版史上的失蹤者〉和江中孝：〈張競生的生平、思想和著述〉，《張競生文集（上卷）》（廣州：廣州出版社，1998年），頁1-22。

年初，北大哲學系譚熙鴻（1891-1956）教授續弦引起一場風波，⁵⁸同年四月，張競生在《晨報副刊》發表了〈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張認為譚和續弦對象陳淑君（1901-?）乃自由戀愛，雖然陳為其亡妻之妹，也並無問題。他藉此事表述了他主張的四大愛情定則：一是有條件的、二是可比較的、三是可變遷的、四是夫妻仍朋友之一種。這篇文章震動文壇，引起一場維持兩個月的大論辯。刊在《晨報副刊》的論辯文章二十四篇，另有三十篇未刊，及大量相關來信，最後以張競生的一篇上萬字的回覆作結。參與大論辯的除了青年學子和一般讀者外，連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許廣平（1898-1968）等都預其事。⁵⁹同在1923年，任白濤（1890-1952）發表一系列關於愛情哲學的譯介，如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戀愛之哲理〉、⁶⁰羽太銳治（1878-1929）〈青年期之性的衛生及道德〉、⁶¹廚川白村（1880-1923）〈戀與食之關係〉、⁶²〈評結婚式〉、⁶³談戀愛與生殖〉、⁶⁴愛倫凱（Ellen

⁵⁸ 蔡登山：《曾經輝煌：被遺忘的文人往事》（臺北：秀威資訊，2008年），頁23-25。

⁵⁹ 這場辯論由1923年4月29日開始，一直討論至6月22日。期間編輯以「記者」身分不斷穿插諸文，說明收稿情況，也多置批評，成功推動了這場熱烈的論辯。張競生：〈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答覆愛情定則的討論（上篇）〉、〈答覆愛情定則的討論（續篇）〉除見《晨報副刊》1923年4月29日，頁4、1923年6月20日，頁1和1923年6月22日，頁1外，亦收於江中孝主編：《張競生文集（上卷）》，頁227-304。後來張培忠將此次論辯所有文章及來信編成一冊，他在代序亦詳細描述了這次大論辯的始末。張培忠編：《愛情定則：現代中國第一次愛情大討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頁1-28。

⁶⁰ 叔本華著，任白濤譯：〈戀愛之哲理〉，《民鐸雜誌》第4卷第4期，1923年，頁1-15。

⁶¹ 羽太銳治著，任白濤譯：〈青年期之性的衛生及道德〉，《教育雜誌》第1卷第8期，1923年，頁1-26。

⁶² 廚川白村著，任白濤譯：〈戀與食之關係〉，《婦女雜誌》第9卷第6期，1923年，頁28-31。

⁶³ 廚川白村著，任白濤譯：〈評結婚式〉，《現代婦女》第23期，1923年4月，頁1。

⁶⁴ 廚川白村著，任白濤譯：〈談戀愛與生殖〉，《民國日報·婦女評論》第99

Key, 1849-1926)〈婦女之道德〉等，⁶⁵ 以後不斷致力於日本和西方愛情哲學的譯介。他的翻譯有其自身的論述考慮（他把廚川之說看成「性倫理學」），⁶⁶ 而多作刪節。⁶⁷

然而，在愛情哲學流行之時，他重點推介廚川白村的論著就值得我們留意。廚川的戀愛論說與叔本華等人的立足點並不一樣，他是立足於文藝，而將諸家之愛情論見收納的。⁶⁸ 例如較早進入中國的〈靈肉合一觀〉，是《文藝思潮論》「希臘思潮之勝利」的其中一節，廚川白村提出靈肉合一，是爲了論證希臘的物質思想爲何能夠充當現代思潮的根柢，而有利於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和象徵主義（Symbolism）這些強調靈肉合一觀念而生的文學。同一章還有「聰明的智力」、「現在生活的享樂」和「美的宗教」三節，提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個人主

期，1923年7月，頁1-2。

⁶⁵ 愛倫凱著，任白濤譯：〈婦女之道德〉，《民鐸雜誌》第5卷第2期，1923年，頁1-14。

⁶⁶ 任白濤譯廚川白村之《戀愛論》，「卷頭語」就說：「照這書的內容看起來：算是一部『性倫理學』，也可以叫做『性道德論』；但是這些名辭，都未免有些生硬，我覺得不如『戀愛論』這個名目醒豁而且明瞭。」任白濤譯訂：《戀愛論》（上海：啟智書局，1934年），頁1。

⁶⁷ 關於這點，當時已經有人撰文指出了任的譯本多有錯譯、刪節和脫落問題，古有成：〈任白濤譯訂「戀愛心理研究」的批評〉，《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頁20-25。

⁶⁸ 戀愛論於20年代的流行，乃五四鼓吹戀愛革命、自由戀愛的後續。這種現象可以從東西洋愛情論說的譯介去掌握。據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社會科學（總類部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戀愛」欄目下列書68種，其中45種在1935年或以前出版，屬於東西洋譯介的竟有25種之多。若果將「兩性問題」、「婚姻」等相關類目計算在內，則更能看到當時對愛情論說的熱衷。本文限於篇幅，只能拈出廚川白村之譯介，但他的論說在當時中國形成熱潮，也直接將戀愛論結合心理分析，探究歐美文學（主要是小說），是以廚川之文本有著示範作用，啟發了當時的文學研究。另一方面，廚川論著廣納歐美的愛情論和文藝論，論者指民國學者把該書當成西洋近代戀愛論的指南書。工藤貴正著，范紫江、張靜、吉田陽子譯：《廚川白村現象在中國與臺灣》（臺北：秀威資訊，2017年），頁65-83。

義、享樂主義等學說，都建基於這種說法。⁶⁹ 他確信將思潮和文藝合而論之，方是研究文藝的不二法門：

講到西洋文藝之系統的研究，則其第一步，當先說明近世一切文藝所要求的歷史的發展。即奔流於文藝根底的思潮，其源係來自何處，到了今日經過了怎樣的變遷，現代文藝的主潮當加以怎樣的歷史的解釋。關於這點，我想竭力的加以首尾一貫的，綜合的說明：這便是本書的目的。⁷⁰

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和《出了象牙之塔》兩書，大量涉及愛情觀在文藝的反映。本來，廚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可以在愛情觀與文藝創作的關係上，對當時文壇有更直接的影響。可惜這部書在當時僅被部分翻譯，即使任白濤於1924年及1926年兩次譯訂此書（題為《戀愛論》），和夏丏尊（1886-1946）翻譯的《近代的戀愛觀》於1928年出版，也都非全貌。⁷¹ 只是，諸位譯者對廚川白村戀愛論說的宣傳，無疑推動了廚川白村在當時文壇的熱熾接受風氣，也有不少意見說廚川是「戀愛至上主義者」。20年代初，廚川的文藝論說得到魯迅、田漢（1898-1968）、鄭伯奇（1895-1979）等人的重視，田、

⁶⁹ 最早翻譯廚川白村〈靈肉合一觀〉是汪馥泉。廚川白村著，馥泉譯：〈靈肉合一觀〉，《民國日報·覺悟》第10卷第4期，1921年10月，頁1。

⁷⁰ 廚川白村著，樊從予譯：《文藝思潮論·序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頁3。

⁷¹ 夏丏尊：《近代的戀愛觀》（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該書全本見廚川白村：《廚川白村全集》第5卷《戀愛觀及雜纂》（東京：改造社，1929年），頁3-284。任白濤1926年譯訂的《戀愛論》，就原書作出了刪訂，例如原書「近代の戀愛觀」第一節是「ラヴ・イズ・ベスト」（即 Love is Best）就被更改為「永久的都城」，第二節「日本人の戀愛觀」給刪掉了，第九節「結婚と戀愛」被移到第四節、緊接「愛之進化」一節，「無批判より肯定まで」原為第八節，任氏移之作第七節「從盲目到肯定」等。關於廚川白村著作的中譯資料，除了工藤貴正外，可參李強《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附錄六「廚川白村著作漢譯本初版一覽表」及附錄七「廚川白村著作（文章）漢譯初版一覽表」，李強：《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北京：崑崙出版社，2008年），頁315-324。

鄭曾訪問廚川，他們和創造社社員經常言及廚川；同時，魯迅又積極翻譯廚川的著作，這使廚川在民國時期得到廣泛的認識和重視。今人工藤貴正專門研究廚川白村在中國文壇的流行現象，他認為廚川遺著《苦悶的象徵》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很大：

《苦悶的象徵》賦予民國文壇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大到可以稱作廚川白村現象那麼大。特別是在關東大地震之前的日本，廚川風靡一時之際，在東京高舉「創造社」旗幟的郭沫若、田漢、鄭伯奇等成員深受其影響。郭沫若在自己的作品中進行模仿、田漢等人登門拜訪廚川，從中可以看出，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深為廚川及其文藝理論所陶醉。⁷²

工藤研究了廚川著作在中國的譯介，指出由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和《出了象牙之塔》都是暢銷書。他整理了廚川著作在中國的出版狀況，亦比對了不同翻譯版本之間的差異，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說明廚川著作在當時中國是極受歡迎的。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徵》十年間印行十二版，發行人數超過18000本，同是魯迅譯的《出了象牙之塔》兩個版本各自出了五版，發行人數超過10000本。⁷³ 中國現代文學如何吸納廚川之說，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尤其魯迅、郭沫若（1892-1978）等人的文學主張和廚川的觀點的關係，已大致有定論。⁷⁴ 然而，學界

⁷² 工藤貴正著，范紫江、張靜、吉田陽子譯：《廚川白村現象在中國與臺灣》，頁63。

⁷³ 資料依「參考資料5」，工藤貴正著，范紫江、張靜、吉田陽子譯：《廚川白村現象在中國與臺灣》，頁308-309。該書列寫了有記錄的出版資料和發行人數，但出版頁沒註明的就沒有列出，例如《苦悶的象徵》1931年重印第十版開始就沒有標示發行人數，《出了象牙之塔》也從1931年新譯初版後沒有標示發行人數，所以實際發行數字應超過上述數字。

⁷⁴ 例如溫儒敏：〈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5期，頁34-46。陳方競：〈《苦悶的象徵》與中國新文學關係考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頁1-20。黃德志：〈廚川白村與中國新文學〉，《文藝理論研究》2000年第2期，頁44-51。李強：〈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頁14-27。又，梁敏兒曾從魯

暫時甚少注意到，廚川之論說也影響著20、30年代的古典文學研究。本文認為，魯迅等人將廚川的「苦悶的象徵」論述帶到中國文壇，而愛情哲學的流行背景和任白濤等人對廚川戀愛論說的譯介，又將廚川的接受收窄到特定範圍內，受到古典文學研究者的歡迎，於是普遍反映在這時期的「評傳」和「事蹟考」文章裡。

論證這個問題並不困難，例如魯迅選譯《苦悶的象徵》「創作論與鑑賞論」，從1924年10月1日起連續20號連載，全書譯本於同年12月出版。而上文提到的章衣萍〈黃仲則評傳〉，這篇撰於1925年的「評傳」已經將《苦悶的象徵》列入參考書目。⁷⁵ 更有趣的是，這時期的「評傳」和「事蹟考」文章非常頻繁地援用「苦悶」作為古代文人的寫作動機，而這「苦悶」又多源於情感上的敏感。例如黃惟庸〈唐女郎魚玄機底詩及其事跡〉，認為魚玄機之虐殺侍婢綠翹，雖然殘忍，「但也至少她底性的苦悶，和她底熱烈的戀情有以使他發生這種戀態的行為的」，並認為她的詩能自寫其情，能夠反映其豐富的情感生活。這篇文章最後甚至指，如果魚玄機故事編成戲劇「必定很能動人；這個叛逆的女性也決不會使『三個叛逆的女性』專美於前的」。⁷⁶ 《三個叛逆的女性》是郭沫若編的歷史劇，強調個性解放和追求戀愛自由。胡雲翼〈北宋四大詞人評傳〉寫了柳永（987-1053）、歐陽脩、蘇軾和秦觀（1049-1100）。他在評柳永時寫道：

如其藝術的動機，果然是要求理想的實現，果然是不滿足的創

迅、周作人購置廚川白村的著作，梳理他們文藝思想的來源，見梁敏兒：〈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學裡的神秘主義〉，《中國文學報》第56期（1998年4月），頁86-118。

⁷⁵ 此文的參考書目有：Prsescott: *Poetic Mind*、Thomas: *Goethe*、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清朝全史》、《清史綱要》、胡適：《國語文學小史》，見章衣萍：〈清代詩人黃仲則評傳（下）〉，頁71。後來北新書局版刪除了參考書目，僅列《兩當軒全集》和《兩當軒詩鈔》於附記。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上海：北新書局，1930年），頁68。

⁷⁶ 黃惟庸：〈唐女郎魚玄機底詩及其事跡〉，《黎明》第42期，1926年8月，頁13。

造，果然是生命的追求；那末，理想是永遠不能現實的，不滿足永遠是不滿足的，生命的追求也不是枉然的嗎？若是一個感覺敏銳的天才創作家，他對於社會人生，只有戀愛，只有痛恨，只有悲觀，只有失望了。⁷⁷

評秦觀又說他是「天生的情痴」，加之經歷孤苦的流放生活，故「怎麼不更要遞倍的苦悶而呼訴出來呢？」⁷⁸ 這都將愛情的壓抑而產生的苦悶作為文學的寫作泉源。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為免累贅，僅再舉何一鴻撰於1941年的〈唐女冠詩人魚玄機評傳〉作例。何氏此文開頭即引廚川白村「文藝是苦悶的象徵」，大段析述文藝家的苦悶，到了頂點發洩出來就是滿塗作者血肉和生命的作品。他指魚玄機出家時還年輕，需要愛情和兩性生活，也需要向玩弄她的男人報復：

她要對薄倖的男人們報復，把男人玩弄女人的手段用來玩弄男人，將過去所有的端淑，癡情……都一變而為浪漫，墮落……走入極端放縱的生活中。⁷⁹

以抒情的發揮，論證其苦悶。然後探其「戀愛至上主義」的「思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篇「評傳」對廚川白村論說的移植。應該說，廚川白村和戀愛論在20年代的流行，如石子投湖般造成陣陣漣漪；這批年輕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不一定都直接從廚川白村汲取營養，但卻很難在這股風潮中置身事外。好像蘇雪林除了研究李商隱的戀史外，亦連接撰有〈清代女詞人顧太清〉、〈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等，以使她被認為對文人之「羅曼司」有特殊興趣。⁸⁰

⁷⁷ 胡雲翼：〈北宋四大詞人評傳〉，《晨報七週紀念增刊》1925年紀念增刊，1925年12月，頁257。

⁷⁸ 胡雲翼：〈北宋四大詞人評傳〉，頁273-274。

⁷⁹ 何一鴻：〈唐女冠詩人魚玄機評傳〉，《新東方雜誌》第2卷第5期，1941年，頁184。

⁸⁰ 任維焜曾說：「余從此深覺此位女士之對於文人『羅曼司』之感到特殊興趣

到了30年代，這種撰作風氣持續不衰，但作者對這種作法有了更深刻的自省，例如周閩風（1906-1992）〈唐六如評傳〉（1932年）在篇中一個註腳交代了他研究唐寅的戀愛與文藝的意圖，是因為感嘆以往中國研究者對於戀愛問題的研究太貧乏了：

關於歐西諸大文學家的戀愛事實，在他們的作品上，儘可不難找；但是我國歷來的文豪詩家，對於性愛作品極少，而讀者且亦極不重視！蓋我國素以禮義為規，男女之間，淵若河漢，與歐西相比，大徑庭矣！⁸¹

又如任維焜（任訪秋，1909-2003）〈袁中郎評傳〉，將袁宏道（1568-1610）鍾情山水，看成與大自然談戀愛，是「移其對於女子之痴情以對自然」。他比較了袁宏道和英國18世紀浪漫派的文藝風格，又引述了廚川白村《東西洋之自然詩觀》，發揮成：

復次就是中國文學中對於男女戀愛的描寫，始終也是很灰色的，但自從受了西方的文學影響後，從內心中感悟了男女戀愛是光明正大的事，所以一方面是去從事於推翻了舊有的禮教，而另一方面就在文中明目張膽的表現了出來。⁸²

整個部分幾乎都援用了廚川的觀點；但更重要仍是對於既有的中國文學研究路線感到不滿足，希望以此方法使中國文學之研究跟上世界潮流，這就不只是名詞或概念的移植了。知此，當思考這些文章的價值時，就可多關心其動機，而不必囿於文章的論述是否嚴密、評斷是否

也……余深望雪林女士能本此精神，賡續前業，而完成一中國文人戀愛史一書，以餉讀者。倘此書能出，吾敢信其不難使『洛陽為之紙貴』也。」見任維焜：〈同適齋讀書劄記·雪林女士之對於文人「羅曼史」之考證〉，《師大國學叢刊》第1卷第3期，1932年，頁102。

⁸¹ 閩風：〈唐六如評傳〉，《清華週刊》第38卷第4期，1932年，頁296。

⁸² 任維焜：〈袁中郎評傳〉，《師大國學叢刊》第1卷第3期，1932年，頁93。

過度等問題。⁸³

國故整理、「人的文學」和戀愛論的交纏，構成「評傳」和「事蹟考」的寫作語境，導引了思考文學價值的新路徑，甚至新秩序。這寫作風潮自始一直不衰，「評傳」也成為其中一種最常見的傳記體裁，發展出各種新的寫作方針。⁸⁴然而，當思考寫作行為、價值調整與背景思潮的關係時，我們不得不考慮本節提及的三個方面。事實上，讓文學離開政教、回歸人心與情感需要，正是20年代追問文學本質時其中一個最常見的話語，而這又逐步反映在30年代以後的文學史書寫裡。無怪乎20、30年代的「評傳」、「事蹟考」文章最具有個人色彩，數量最多，也最能接通文學史的寫作思路，這本來就應和著當時的時代脈搏。如此，當時之思潮土壤滋養這兩種體裁的寫作繁花，最後在文學史裡結果。

此外，文章的大量出產也與當時報刊的空前蓬勃有關。《中國近代報刊名錄》所收1815-1911年間的中文報刊有1753種，⁸⁵而民國

⁸³ 本節提及的例子，部分引起論者的尖銳批評，特別是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蹟考》，上文曾引述的張振珮和任維焜的意見。楊鴻烈《大思想家袁枚評傳》也曾受余牧之的評批，認為袁枚並不够資格冠以「大思想家」之名。見拯眾：〈評大思想家袁枚評傳〉，《文社月刊》第3卷第1期，1927年，頁99。

⁸⁴ 當今「評傳」寫作已譜系化，有專門針對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評傳叢書，例如匡亞明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1995年起出200部）、范伯群主編、蘇州大學出版社的「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1994年起出12部）等、謝柏梁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京昆藝術家評傳叢書」（2010年起擬出12種）等。學界也逐漸訂定了一些寫作原則，例如傳主必須是有影響力之名人，理應已過世，必須「傳」、「評」並重地對傳主的人生和作品作出整體的省察和觀照，也需要對作家活動與寫作的社會背景、當時的文學思潮特別是其創作有詳細而真切的把握等。可參周俊超：〈中國評傳發展之我見〉，《文史博覽（理論）》2014年第2期，頁47；周俊超：〈評傳特徵考察——以《胡適評傳》為例〉，《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4年第5期，頁67；謝有順：〈總序〉，《賈平凹評傳》（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及曉華、汪政：〈作家傳記與文學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頁125。

⁸⁵ 史和、姚福申、葉翠娣：《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

時期(1911-1948)的報刊卻有超過25000種。⁸⁶統計數字受限於材料的發現與整理，但民國時期報刊之繁榮已可見一斑。學界也關注報刊對於傳播現代思想、文藝的作用。⁸⁷本文所涉的「評傳」和「事蹟考」文章，大部分見於或者初刊於報刊。載體的商業特點多方面制約著文章的作法，篇幅有限亦讓這些文章必須盡快達到奪人眼球的效果。20、30年代，這些文章許多都將傳主之事功和官履從簡，甚至略去不提，而將篇幅用於表現傳主的情感文學特點和戀愛事跡。筆者認為這並不代表文章作者必然推翻傳主在事功方面的貢獻，但卻足以說明突出個人主義在這時期的寫作策略上更占有優先位置，因其能應合當時的文藝思潮。這也解釋了30年代中期開始，關於愛國文人的「評傳」和「事蹟考」相繼出現的原因。⁸⁸只是愛國主義寫作策略流行之時，文學觀念的古今轉化業已完成，是以本文毋需對此多加析述。載體與文章，文章與觀念，共同組構出屬於「現代」的「文學景觀」，讓文學在減褪的史學色彩中大放異彩。⁸⁹不管「評傳」此後的發展如

⁸⁶ 數字來自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1911-1949):1-11輯」,網址:<http://www.cnbkysy.cn>,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⁸⁷ 例如耿傳明、于冰輪就提出報刊與文學有「共生性的繁榮」,促成了晚清文學各種「現代性」的表現。耿傳明、于冰輪:〈清末報刊與文學的共生性繁榮與世界的「圖像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33-42。張瑜研究近代報刊的形式和地域分布,說明其對現代文學傳播的作用。張瑜:〈現代傳播空間的建構與新文學的發生〉,《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頁130-140。常恆暢從近代報刊的欄目分類,分析舊文體受到的衝擊,及其對新式俗文體的興起的影響。常恆暢:〈近代報刊的文體學意義〉,《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頁216-223。

⁸⁸ 例如田劍光:〈愛國詩人謝皋羽評傳〉,《福建文化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頁49-58。陳福熙:〈辛棄疾評傳〉,《戰時中學生》第1卷第12期,1939年,頁75-79。唐圭璋:〈姜白石評傳〉,《新中華》復1第6期,1943年,頁79-91。

⁸⁹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1936-2015)著名論述「想像的共同體」,也曾指出印刷品乃孕育新的共時性觀念的關鍵,並以「單日的暢銷書」觀念說明歐洲15至16世紀報紙的蓬勃情況,和當中的消費特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

何，在這段時間裡，也必須被納入文學範疇來審視。

至於要論證這些文章的「新」，如何在文學觀念由舊到新的過程上擔當著重要角色，本文還得在「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裡尋求答案。

四、「評傳」和「事蹟考」的「現代性」及對文學史的影響

(一)「現代性」與「自我」的發現

「現代性」在19世紀的西方有著紛繁多樣的討論，它既可以是時間性概念，亦可以作為美學概念出現。而且，它也可以指涉與現代工業文明同時出現的粗俗及陳腐，例如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墓中回憶錄》對「現代性」予以貶義用法，不啻是對現代文明的一種反諷。⁹⁰至於「為藝術而藝術」的命題，無疑也是對現代的粗鄙庸俗作出的表態，而將藝術從功利性抽離，甚至成為一種「無償性」(gratuitousness)的存在。⁹¹以此思考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31-32。

⁹⁰ 夏多布里昂著，郭宏安譯：《墓中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⁹¹ 關於與本文相關的諸種「現代性」(modernity)研究，可參馬泰·卡林內斯庫著，顧愛材、李瑞華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後現代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馬歇爾·伯曼著，張輯、徐大建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戴維·弗里斯比著，盧暉臨譯：《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亦可參龔卓軍：〈審美現代性之爭：哈伯瑪斯與傅柯論波特萊爾〉，《中外文學》第30卷第11期(2002年4月)，頁32-61。蔣孝軍：〈個體觀念與現代性的展開〉，《鵝湖月刊》第445期(2012年7月)，頁55-62。陳幼慧：〈「主體性」(Subjectivity)與「現代性」(Modernity)：黑格爾與哈伯瑪斯之「現代性論述」〉，《哲學與文化》第39卷第12期(2012年12月)，頁125-145等。中國語境的相關論述，可參 Hanping Chiu, "The Reception of Modernity in East Asia: Japan in China's Encounter with the

「評傳」和「事蹟考」的寫作特點，不難發現它們正表現出對現代的焦慮不安，傳主面對的處境，可以解釋成文章作者面對現代處境時之想像性易地而處。所以，「我」與客觀現實的緊張關係、詩文如何表現這種關係，往往是這些文章的闡發重點。

郁達夫（1896-1945）散文〈零餘者〉質問「我」對世界、中國、家庭的用處，最終自覺一無是處。⁹² 研究者指出，郁氏受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影響，以小說寫出了許多「零餘者」形象。⁹³「零餘者」（superfluous man），有說是「多餘人」及「世紀兒」同類，他們的特點是有才華但對黑暗的現實感到無力，充滿苦悶、悲觀和抑鬱。蔡振念曾撰文討論過西方「現代性」的多種來源，並指郁達夫作品及「零餘者」的頹廢，是一種參考西方和日本文學而成的「預借的現代性」。⁹⁴ 個人自覺思考其跟現代社會的關係，出於憂患，即使頹敗，也是「現代性」的表現。辛金順研究錢鍾書（1910-1998）小說時，有以下一段話：

若從文本的解讀和窺探，錢鍾書並無意在創作裡去虛構或膨脹知識份子的角色，相反的，他甚至還有意把五四時期那些被神話了的知識份子形象，從高高的殿堂拉下，還其為一個個為名利、感情、夢想而掙扎的普通人。唯其如此，錢鍾書才能透視這一群人背後卑微的靈魂，並將他們置於人生和人性的手術臺

West,” *Tamkang Review* 42, no. 1 (2011.12): 71-101。丘為君：〈「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46卷第1期（2008年3月），頁75-123等。

⁹² 郁達夫：〈零餘者的自覺〉，《太平洋》第4卷第7期，1924年6月，頁1-8。

⁹³ 郁達夫作品與俄國及西方文學的關係，向受研究者關注，夏志清、李歐梵、許子東等人都有專門論述。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77-83、李歐梵：〈現代中國文學中的浪漫個人主義〉及〈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現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45-69及141-174、許子東：《郁達夫新論》（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

⁹⁴ 蔡振念：〈預借的現代性——論郁達夫對西方頹廢美學的挪用〉，《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13期（2009年6月），頁1-22。

面上來加以解剖。⁹⁵

筆者認為：這一種呈現個人處於社會中的心理和情緒，不獨見於現代文學，也普遍見於研究古代作家的「評傳」和「事蹟考」。就選題而言，所以這段時期最熱門的傳主，幾乎都是文學史上的畸人和「零餘者」。黃仲則才高志大，但科舉不順，性格孤傲，行跡放浪，結果貧病一生，英年早逝，其詩歌透露出跟乾隆盛世的格格不入。李商隱文名早著，卻科考屢挫，仕途坎坷，大半生都消磨在幕客生涯。即使大詩人李白，雖曾有「我輩豈是蓬蒿人」之壯語，但其為人所記的是詩歌，是傳說，是嗜酒，又何嘗關乎功業？納蘭性德家世顯赫，博學強記，又得康熙（1654-1722）賞識，雖有官銜而無實績，其作品滿目皆是「愁」、「恨」，三段婚姻及戀事廣為流傳，年僅三十而亡亦讓人惋惜。曹植才高八斗，但卻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終身亦未有在政治上展翅的機會。這些失敗者，竟然得到現代「評傳」和「事蹟考」作者的追捧，被套入個人主義的書寫策略，將戀愛、抒情看成是傳主與現實社會扞格不入的憤懣。優秀的作家也是普通人，他們只是擅於用文學作品將普通人的心理和情緒探索和抒寫出來。⁹⁶

所以，一切皆是特定語境下之選擇。文學革命後新舊文學的爭逐格局，帶動整理國故的風潮，讓古代文學的研究法得到反思及調整，使研究者選擇與以往不同的視角和方法進行研究；個人主義的發揚，讓文學作家被選擇為研究的對象，也讓「評傳」和「事蹟考」成為最切合需要的文類；「人的文學」的主張及推廣，使研究者將更多被傳統

⁹⁵ 辛金順：〈審視與反思——論錢鍾書小說中的文化命題〉，《中外文學》第30卷第11期（2002年4月），頁191。

⁹⁶ 陳國球在2009年中華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講評中提到：「直到20世紀初，由於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盛行，傳記的焦點也由『偉人』轉到『常人』，而更重視人物性格的內心探索」。陳國球：〈於歷史與文學間遊蕩的傳記文學——研討會第一節講評〉，收於寒山碧、楊玉峰等主編：《理論探討與文本研究：中華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528。

排斥的思想及行徑納入重新思考的範圍，讓作家的戀事、軼聞、價值觀成爲研究的可行選項。本文認爲，這些文章昭示了忠實表現自己的文學，才是好的文學。⁹⁷ 這種忠實包括對缺陷的不隱諱、對靈慾需求的自覺表達。逸鴻〈阮嗣宗評傳〉有一段話相當精警：

所謂文藝的真正價值，就是忠實的表現自己，只要忠實的表現了自己，同時也就是表現了社會。因爲個人既不能夠離開社會而單獨地存在，那麼他的意識和情感也就不想脫離掉社會而專是個人的，雖然不專意去描寫社會，但無意中也就把社會的色彩渲染出來，所以說真正偉大的文藝作品，並不一定就是描寫大眾的生活，因爲那種公式化的標語口號文學，是沒有藝術價值的，它只能做爲一種政治或一種主義的附庸，而缺乏文藝的獨立的性能。⁹⁸

忠實表現自己，也就自然能表現社會；推而論之，也能表現文學傳統的特質。方法上的「現代」，並不意味著對傳統的揚棄，「評傳」和「事蹟考」的作者，應當相信這種寫法能夠更準確地探視古代文人的真實內在。所以，他們在行文中往往將傳主及其文學和古今中外的作家和文藝比較，以論定其貢獻。例如胡雲翼認爲李清照在文學史的地位，能夠與屈原（340-278BC）、陶潛（365-427）和杜甫一樣並垂不朽。⁹⁹ 王風將李白在中國詩壇的地位，與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在19世紀英國詩壇的地位一樣，同屬浪漫派詩人。¹⁰⁰ 迺敦（曾迺敦，?-1967）〈柳永評傳〉肯定柳永情詞，認爲若作家都「留意儒雅」及「官場得意」，那「中國文學，必無庸有史，唐宋亦必無詩詞，元明

⁹⁷ 張壽林曾言：「自己寫自己的實感，那就是我們所期待的文藝。」張壽林：〈文藝與實感〉，《京報副刊·文學周刊》第27期，1925年7月，頁8。

⁹⁸ 逸鴻：〈阮嗣宗評傳〉，《新東方》第2卷第8期，1941年，頁147。

⁹⁹ 胡雲翼：〈李清照評傳〉，《晨報副刊·藝林旬刊》第13期，1925年8月，頁8。

¹⁰⁰ 王風：〈大詩人李白評傳〉，《新東方雜誌》第1卷第9期，1940年，頁150。

又何能有戲曲，至今觸目盡是洋洋應制時文矣」。¹⁰¹馬厚文(1903-1989)批評有些文學史不提韓愈，他指韓之文學主張，是屬於西洋「為人生的藝術」一派。¹⁰²又如上文曾引述黃惟庸之〈唐女郎魚玄機底詩及其事跡〉，將魚氏與郭沫若《三個叛逆的女性》比擬。¹⁰³這些比照及判斷，已經進入了文學史的領域。

以上富有「現代性」的寫作動機，使研究國學在當時等同於尋根和認識自我的行為。張壽林當時有〈我們研究中國文學應取的態度〉，文章清晰說明了舊文學和新文學的研究應該「互相取證、互相為用」，因為研究舊文學能夠「助理新文學的展進，而使一般人對於現代的文學更徹底的了解」。然後談研究範圍和方法，在「個人的研究」就提及「評傳」，認為能夠使人知道在不同環境中，如何形成他個人的個性和作風、思想與情感。¹⁰⁴故此他主張多作「評傳」，他自己也寫了〈易安居士評傳〉。這些論述熱切關注「人」與「環境」的關係，區別於「文學」反映「客觀世界」的模仿論(mimetic theory)，和「文學」教化「讀者」的致用論(pragmatic theory)，而實質上是以「人」為中心，在「人」與「客觀世界」之間搭建一道名為「文學」的橋樑，與「人」身處的「客觀世界」構成相互參照的關係。所以，「評傳」雖然需要評論文學作品，但研究作家如何利用文學去面對世界才是其旨歸。如此，我們對文學理解愈深入，對傳主的人格和其眼中之客觀世界的理解就愈深刻，這種深刻並不仰賴文學描劃的客觀世界有多真實，也無法利用「善／惡」、「美／醜」、「真／偽」等標準去衡量其價值，它是依仗我們對傳主的文學手段有多少認識。¹⁰⁵這就能理解為

¹⁰¹ 迺敦：〈柳永評傳〉，《之江》第4、5期，1933年，頁20。

¹⁰² 馬厚文：〈韓愈評傳〉，《光華附中半月刊》第3期，1932年，頁2。

¹⁰³ 黃惟庸：〈唐女郎魚玄機底詩及其事跡〉，頁13。

¹⁰⁴ 張壽林：〈我們研究中國文學應取的態度〉，《京報附設之第六種週刊·文學週刊》第38期，1925年10月，頁99。

¹⁰⁵ 鄭毓瑜論述晚清民初的文化狀態時，曾說：「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面對晚清民初在知識、思想、社會文化或政治狀態的描述，再也無法用『新／舊』、『東／西』、『傳統／現代』或『革命／改良』的二分模式，因為『非此

何廚川白村「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那樣受「評傳」和「事蹟考」作者歡迎，也能明白為何抒情之筆和猜想之言可以大量出現在這些文章裡，更不必為他們對傳主的軼聞和事蹟的好奇而感到詫異。「評傳」和「事蹟考」實踐的既是表現論 (expressive theory)，也是抒情論 (lyrical theory)。正如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 所言，個人主義的認識和挪用，使當時的人認識到自己的存在和特徵後，才能爭取權利，按自己意願去安排生活、決定自己命運。¹⁰⁶

(二) 觀念的採納與打開缺口的文學史書寫

事實上，上文提到的部分「評傳」和「事蹟考」，後來都陸續成書出版了。胡雲翼兩篇「評傳」後來演化成其《宋詞研究》，於192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中國詞史略》則在1933年由上海大陸書局出版；相關內容也見於《新著中國文學史》內宋詞部分，1931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楊鴻烈(1903-1977)《袁枚評傳》全書以《大思想家袁枚評傳》於1927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來1933年收入王雲五(1888-1979)主編的「國學小叢書」，更名《袁枚評傳》。章衣萍〈清代詩人黃仲則評傳〉亦於1930年由上海北新書局以《黃仲則評傳》為題出版。蘇雪林《李義山戀愛事蹟考》於1927年出版就引起不少迴響，但此書多次再版，後來更名《玉溪詩謎》於40年代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然後蘇氏更於80年代再次修訂此書，編成《玉溪詩謎正續合編》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這說明了，這批研究成功占據出版市場的位置，爭取了一定的讀者(無論認同還是批評的讀者)，

即彼』的二選一，在割裂了時空變遷的前後拉鋸的同時，也輕易稀釋或迴避了詮釋的來往曲折」，又指出：「黃遵憲在詩中體現的問題，甚至比他所能解決的問題更為重要」。這些觀察也能借來審視本文的課題。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2017年)，頁15、22。

¹⁰⁶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收於雅羅斯拉夫·普實克著，李燕齊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1-29。

在古典文學研究史上占一席位。

陳平原評論五四和現代文學時，就曾指出五四新文化人一開始便有明確的文學史意識，喜歡在文學史框架中討論問題：

不管是「破舊」還是「立新」，講「進化」還是主「演變」，其工作動力及理論預設，均來自「文學史」的想像。¹⁰⁷

「評傳」和「事蹟考」之作者承擔的不是史官之職，而是文學史家之責。他們不必理會文章有沒有統治者鑑照之用，也毋需從道德層面垂訓後人。由五四運動到國故整理運動大張旗鼓期間，文學觀念百花齊放，作者可以在寬闊的空間任意馳騁；所以，個人主義、戀愛至上主義、享樂主義、白話文學、情感文學等等，都可以通過論者的挪用及評斷，賦予傳主新的文學史位置。更何況，如上文提到，有些作者本身亦從事文學史的寫作與研究，例如胡雲翼及譚正璧，前者寫出了《新著中國文學史》、《宋詞研究》、《中國詞史略》等，後者又有《中國文學進化史》、《中國文學史大綱》、《中國女性文學史》等文學史著作。這些著作都強調反思文學史、適應新時代文學需要的書寫方針，而書中亦收納了「評傳」和「事蹟考」研究成果，或者從中反映出來的觀念。如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有「新時代的文學」裡有「舊文學的整理」一節，將楊鴻烈《大思想家袁枚評傳》、蘇雪林《李義山的戀愛事蹟考》收入作家和作品研究一部分。另外，在論詩歌部分又引入了蘇雪林對李商隱戀愛事蹟的研究。譚氏於《中國女性文學史》也採用了「評傳」對於魚玄機心理的判斷，並對其在當時文人才子中的周旋事蹟，和詩作有詳細介紹。¹⁰⁸胡雲翼的《宋詞研究》（1926

¹⁰⁷ 陳平原：〈四代學者的「文學史」圖像〉，收於陳平原：《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頁16-17。該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頁67-73。

¹⁰⁸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上海：光明書局，1929年），頁133-134、384。又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初版刊於1930年，後於1934年補正改題《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138-147。胡

年)和《新著中國文學史》(1932年),也使用了他之前所撰「評傳」對於歐陽修、李清照等詞人的研究成果。

可以說,「評傳」和「事蹟考」的書寫打開了文學史寫作的缺口,讓現代人編寫的文學史更具有現代人的關懷。

五、結論

郁達夫〈什麼是傳記文學〉云：

所以若要寫新的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來寫，纔可以見得真，說得像。

又：

傳記文學，是一種藝術的作品，要點并不在事實的詳盡記載，如科學之類；也不在以好例惡例，而成爲道德的教條。¹⁰⁹

對傳主心理尋繹愈細、對語境代入要求愈真、對藝術手法追求愈切，作品的抒情特點和文學性便愈突出。如果必須將「評傳」和「事蹟考」歸類，它們當歸屬於新興的傳記文學，而不是傳統的歷史傳記。從寫作的方法和進入古典文學研究及文學史著作的成果來看，「當下」才是「論古」的目的。即使將視界推前至梁啟超，他反思古代傳記作法，參照西方傳記，身體力行地撰寫近百萬言的傳記，以達其「維新吾民」之旨。論者指其「意在從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挖掘可資

雲翼：《宋詞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26年），頁78-138。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上海：北新書局，1947年），頁175-188。

¹⁰⁹ 郁達夫：〈什麼是傳記文學〉，傳東華編：《文學百題》（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頁240-242。

借鑒的思想資源，激發國人的自信心和愛國心，凸顯出強烈的啟蒙心態和時代意識」；¹¹⁰再如朱東潤（1896-1988），他的《張居正大傳》被譽為傳記文學經典之作。他曾界定「評傳」是傳記文學的支流，亦批評過梁啟超《王荊公評傳》的寫法。¹¹¹陳世驥（1912-1971）曾指出：朱東潤撰於30年代初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以批評家為綱目，而不以時期或流派，他的目標或許正是孟子之「知其人」。而《張居正大傳》之突破，就是放在傳記文學的傳統脈絡下，方可看到：

在巨大的「正史」之下，「子傳記」中的個人生命就如同車輪中的齒輪一般微不足道，僅僅只是插入政治潮流與事件之中的註解，在這本「大傳」之中，形勢顛倒而主容易位。主人翁聳立在那裡，所有的社會與政治機制、系統與規範，就如同是其才能與人格特質的反射鏡像一般出現。相較於作為史學家檔案的刻板文章，這些客觀事件反過頭來取得更豐富的生命力與意義。¹¹²

陳世驥追溯朱東潤傳記觀的來龍去脈，撿出與傳統之差異在於「以人為本」，一針見血道出了朱氏傳記的特點。駱玉明在紀念乃師的文章亦提到：朱東潤的傳記文學撰寫，都和當日的特定環境直接相關。又說朱之〈杜甫敘論〉「敘論」是「評傳」的意思，但又不像一般的「評傳」，以大切八塊、分項論述的方法，而仍以生平行事為主線，以時代風雲為背景。¹¹³梁、朱二人的傳記寫作都透露出對現世的關懷。傳主作為一個已故去的獨立個體，他／她如何在其時代、以至於如何對後代產生意義，都由傳記作者去詮釋。誠然，這或可歸之於鑑古知今

¹¹⁰ 胡全章：〈梁啟超與20世紀初年新體傳記的興盛〉，《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頁165。

¹¹¹ 朱東潤：〈論傳記文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頁9。

¹¹² 陳世驥著，高文萱譯，陳國球校訂：〈中國傳記書寫的創舉〉，《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6月），頁305。

¹¹³ 駱玉明：〈中國傳記文學家朱東潤〉，《讀書》1990年8月號，頁112-119。

之歷史意識，但傳主和傳記作者之主觀意識之遙接和共振，卻更讓人心馳神醉。

本文考察民國時期的古代文人「評傳」和「事蹟考」寫作，著眼點正在觀察這些文本透露的主觀意識，如何置入他們的淑世關懷。而研究時間段的選取、文體特點的省察，也爲了將相關的核心觀念更方便地提取出來。透過本文論述，可以發現今人的文學批評價值實乃經過一段蘊釀過程始形成，當中摻雜了複雜的文化背景，跟社會觀念和文藝思潮息息相關；在此以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關係不是非此即彼的。以「評傳」和「事蹟考」爲方法，可以打開研究的邊界；因爲這兩種文章，正經歷著由傳統史傳到傳記文學的演進，同樣和應著時代變革下的種種個人需要。這些文章對傳主文藝價值的關注及重估，彰顯著新的、現代的、以人爲本的文學批評價值已經漸次成形。本文細析這些文章的特點、背景和影響，冀能說明新的文學批評價值緣何而來、因何而變。

徵引書目

- 川合康三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
- 工藤貴正著，范紫江、張靜、吉田陽子譯：《廚川白村現象在中國與臺灣》，臺北：秀威資訊，2017年。
- 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編譯：《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62年。
- 中國之新民：〈新史學·懸談二·論書法〉，《新民叢報》匯編2第6期，1900年。
- 卞兆明：〈論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創作〉，《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頁149-152。
- 王伯祥：〈國故的地位〉，《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頁134-135。
- 王 風：〈大詩人李白評傳〉，《新東方雜誌》第1卷第9期，1940年，頁150。
- 王 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王鳴劍：〈張競生的性學普及之旅——兼論與梁實秋的性學論爭〉，《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第131期，2011年，頁74-77。
- 丘爲君：〈「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46卷第1期，2008年3月，頁75-123。
-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社會科學（總類部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古有成：〈任白濤譯訂「戀愛心理研究」的批評〉，《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頁20-25。
- 史和、姚福申、葉翠娣：《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 甘禮俊：〈唐女冠魚玄機戀愛事績考證〉，《明強》第2卷第2期，1931年，頁87-101。
- 田劍光：〈愛國詩人謝皋羽評傳〉，《福建文化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頁49-58。
- 任白濤譯訂：《戀愛論》，上海：啟智書局，1934年。
- 任維焜：〈同適齋讀書劄記·雪林女士之對於文人「羅曼史」之考證〉，《師大國學叢刊》第1卷第3期，1932年，頁102。
- 任維焜：〈袁中郎評傳〉，《師大國學叢刊》第1卷第3期，1932年，頁57-101。
- 朱東潤：〈論傳記文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頁5-10。
- 朱東潤：《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第1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
- 朱彝尊：《曝書亭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7-13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羽太銳治著，任白濤譯：〈青年期之性的衛生及道德〉，《教育雜誌》第1卷第8期，1923年，頁1-26。
- 西諦：〈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文學旬刊》第51期，1922年10月，頁1-2。
- 何一鴻：〈唐女冠詩人魚玄機評傳〉，《新東方雜誌》第2卷第5期，1941年，頁183-190。
- 何壽慈：〈韋莊評傳〉，《中國文學季刊》創刊號，1929年8月，頁1-21。
- 余祥森：〈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頁135-138。
- 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李星、孫見喜：《賈平凹評傳》，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李 強：《廚川白村文藝思想研究》，北京：崑崙出版社，2008年。
-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 汪榮祖：〈西方史家對所謂「儒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臺大歷史學報》第27期，2001年6月，頁125-149。
- 汪靜之：〈平民詩人杜甫〉，《學林》第2卷第5期，1926年，頁82-113。
- 私立東吳大學同學會編：〈著述介紹·蘇雪林教授·《李義山戀愛事跡攷證》〉，《老少年》第5卷第2期，1928年，頁7。
- 辛金順：〈審視與反思——論錢鍾書小說中的文化命題〉，《中外文學》第30卷第11期，2002年4月，頁185-220。
- 叔本華著，任白濤譯：〈戀愛之哲理〉，《民鐸雜誌》第4卷第4期，1923年，頁1-15。
- 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頁578-584。
- 周俊超：〈中國評傳發展之我見〉，《文史博覽（理論）》2014年第2期，頁46-49。
- 周俊超：〈評傳特徵考察——以《胡適評傳》為例〉，《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4年第5期，頁67-69。
- 邱竹師：〈黃景仁及其戀愛詩歌〉，《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頁1-20。
- 拯 眾：〈評大思想家袁枚評傳〉，《文社月刊》第3卷第1期，1927年，頁99。
- 胡元儀：《北海三考》，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胡全章：〈梁啟超與20世紀初年新體傳記的興盛〉，《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頁161-171。
- 胡雲翼：〈北宋四大詞人評傳〉，《晨報七週紀念增刊》1925年紀念增刊，1925年12月，頁256-274。
- 胡雲翼：〈李清照評傳〉，《晨報副刊·藝林旬刊》第13期，1925年8

- 月，頁8-9。
- 胡雲翼：《宋詞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26年。
- 胡雲翼：《新著中國文學史》，上海：北新書局，1947年。
- 胡適：《四十自述》第1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37年。
- 郁達夫：〈零餘者的自覺〉，《太平洋》第4卷第7期，1924年6月，頁1-8。
- 唐圭璋：〈姜白石評傳〉，《新中華》復1第6期，1943年，頁79-91。
- 夏多布里昂著，郭宏安譯：《墓中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 夏志清：《人的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素癡：〈評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國民週報》第5卷第50期，1928年，頁1-2。
- 耿傳明、于冰輪：〈清末報刊與文學的共生性繁榮與世界的「圖像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33-42。
- 耿傳明：《決絕與眷戀：清末民初社會心態與文學轉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迺敦：〈柳永評傳〉，《之江》第4、5期，1933年，頁16-27。
- 馬厚文：〈韓愈評傳〉，《光華附中半月刊》第3期，1932年，頁2-8。
- 馬泰·卡林內斯庫著，顧愛材、李瑞華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後現代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 馬歇爾·伯曼著，張輯、徐大建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高商一究研股：〈杜甫評傳〉，《稽山學生》1934年1月號，頁62-66。
- 高譽廣：〈詞人歐陽修評傳〉，《無錫中學校刊》第1卷第4期，1930

- 年，頁88-96。
- 常恒暢：〈近代報刊的文體學意義〉，《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頁216-223。
- 張恩榮：〈李謫仙評傳〉，《一中月刊》1934年6月卷，頁28-32。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張振珮：〈李義山評傳（中篇）〉，《學風（安慶）》第3卷第8期，1933年，頁27-42。
- 張培忠編：《愛情定則：現代中國第一次愛情大討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 張瑜：〈現代傳播空間的建構與新文學的發生〉，《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頁130-140。
- 張瑞穗：〈中國傳記的一些問題〉，《東海中文學報》第8期，1988年7月，頁105-116。
- 張壽林：〈文藝與實感〉，《京報副刊·文學周刊》第27期，1925年7月，頁8。
- 張壽林：〈我們研究中國文學應取的態度〉，《京報附設之第六種週刊·文學週刊》第38期，1925年10月，頁97-100。
- 張壽林：〈易安居士評傳〉，《京報附設之第六種週刊·文學週刊》第3期，1924年12月，頁1-4。
- 張競生：《張競生文集》（上卷），廣州：廣州出版社，1998年。
- 梁啟超：〈情聖杜甫〉，《紹興教育界》第1卷第3期，1922年，頁1-15。
- 梁敏兒：〈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學裡的神秘主義〉，《中國文學報》第56期，1998年4月，頁86-118。
- 章衣萍：《杜甫》，上海：兒童書局，1935年。
- 章衣萍：《黃仲則評傳》，上海：北新書局，1930年。
- 章依萍：〈清代詩人黃仲則評傳〉上，《學林雜誌》第1卷12期，1925年6月，頁1-16。
- 章依萍：〈清代詩人黃仲則評傳〉下，《學林雜誌》第2卷2期，1925

年11月，頁1-14。

許子東：《郁達夫新論》，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

許君遠：〈論傳記文學〉，《東方雜誌》第39卷第3期，1943年，頁51-54。

郭久麟：《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太原：山西出版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郭紹虞：〈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文學年報》第1期，1932年，頁1-26。

郭德諾：〈李後主評傳〉，《文學年報》第1期，1932年，頁1-38。

陳方競：〈《苦悶的象徵》與中國新文學關係考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頁1-20。

陳世驥著，高文萱譯，陳國球校訂：〈中國傳記書寫的創舉〉，《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6月，頁293-306。

陳平原：《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陳幼慧：〈「主體性」(Subjectivity)與「現代性」(Modernity)：黑格爾與哈伯瑪斯之「現代性論述」〉，《哲學與文化》第39卷第12期，2012年12月，頁125-145。

陳國球：〈於歷史與文學間遊蕩的傳記文學——研討會第一節講評〉，收於寒山碧、楊玉峰等主編：《理論探討與文本研究：中華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527-534。

陳福熙：〈辛棄疾評傳〉，《戰時中學生》第1卷第12期，1939年，頁75-79。

陶 鈺：〈鄭板橋戀愛事蹟考〉，《實報半月刊》第2卷第15期，1937年，頁69-73。

雪林女士：〈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下篇）〉，《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1卷第4期，1931年，頁715-745。

雪林女士：〈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

- 刊》第1卷第3期，1930年，頁525-564。
- 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上海：北新書局，1927年。
- 傅東華編：《文學百題》，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
- 傅東華選註：《杜甫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 辜也平：〈論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建構之流脈〉，《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20-38。
- 辜鴻銘譯：〈贈衛八處士〉，《英語周刊》第250期，1920年，頁697。
- 逸鴻：〈阮嗣宗評傳〉，《新東方》第2卷第8期，1941年，頁147-154。
-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收於雅羅斯拉夫·普實克著，李燕齊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
- 黃自鴻、胡梓穎：〈傳記與辨體觀——內部衝突的分類過程〉，《漢學研究》第34卷第1期，2016年3月，頁95-121。
- 黃惟庸：〈唐女郎魚玄機底詩及其事跡〉，《黎明》第42期，1926年8月，頁9-13。
- 黃德志：〈廚川白村與中國新文學〉，《文藝理論研究》2000年第2期，頁44-51。
- 愛倫凱著，任白濤譯：〈婦女之道德〉，《民鐸雜誌》第5卷第2期，1923年。
- 楊鴻烈：《大思想家袁枚評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
- 溫儒敏：〈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5期，頁34-46。
- 葉倬璋：〈抒情傳統與現代——黃仲則詩在民國〉，《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頁181-210。
- 葛民峰、李延林：〈艾米·洛威爾漢詩譯集《松花箋》及仿中國詩研究〉，《西安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頁107-112。
- 虞洽卿、袁禮敦等：〈現代人自傳運動緣起〉，《青年文會》第2卷第10

- 期，1941年，頁691。
- 聞一多：〈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頁7-22。
- 劉奇芳：〈李白評傳〉，《五華一中月刊》1934年6月卷，頁15-17。
- 劉海霞：《前期創造社同人自傳文本研究——以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爲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 廚川白村：《廚川白村全集》第五卷，東京：改造社，1929年。
- 廚川白村著，任白濤譯：〈評結婚式〉，《現代婦女》第23期，1923年4月，頁1。
- 廚川白村著，任白濤譯：〈戀與食之關係〉，《婦女雜誌》第9卷第6期，1923年，頁28-31。
- 廚川白村著，任白濤譯：〈談戀愛與生殖〉，《民國日報·婦女評論》第99期，1923年7月。
- 廚川白村著，樊從予譯：《文藝思潮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
- 廚川白村著，馥泉譯：〈靈肉合一觀〉，《民國日報·覺悟》第10卷第4期，1921年10月，頁1。
- 撰人不詳：《平巢事蹟考》，收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歐陽脩、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蔡振念：〈預借的現代性——論郁達夫對西方頹廢美學的挪用〉，《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13期，2009年6月，頁1-22。
- 蔡登山：《曾經輝煌：被遺忘的文人往事》，臺北：秀威資訊，2008年。
- 蔣孝軍：〈個體觀念與現代性的展開〉，《鵝湖月刊》第445期，2012年7月，頁55-62。
- 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香港：古文書局，1970年。
-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2017年。
- 閻風：〈唐六如評傳〉，《清華週刊》第38卷第4期，1932年，頁287-315。

- 曉華、汪政：〈作家傳記與文學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頁124-126。
- 駱玉明：〈中國傳記文學家朱東潤〉，《讀書》1990年8月號，頁112-119。
- 戴維·弗里斯比著，盧暉臨譯：《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謝昭新：〈論三十年代傳記文學理念與自傳寫作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5期，頁145-160
- 豐華瞻：〈艾米·洛厄爾與中國詩〉，《外國文學研究》1983年第4期，頁121-123。
- 馥泉：〈整理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見及其他〉，《文學旬刊》第53期，1922年10月，頁1。
- 羅慕華：〈納蘭性德〉，《晨報副刊》，10月8、10、12-15、17日。
-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上海：光明書局，1929年。
- 譚正璧：〈李義山詩的鑰匙——錦瑟詩〉，《萬歲》第2卷第1期，1943年，頁36-41。
- 譚正璧：〈清代詩人黃仲則戀愛事蹟考〉，《大眾（上海）》第31期，1945年，頁90-94。
-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年。
- 譚雯：〈「洛神賦」主角戀愛事蹟考〉，《萬象》第2卷第8期，1943年，頁24-35。
- 龔卓軍：〈審美現代性之爭：哈伯瑪斯與傅柯論波特萊爾〉，《中外文學》第30卷第11期，2002年4月，頁32-61。
-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1-11輯」，網址：<http://www.cnbksy.cn>，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 「晚清民國大報庫」，網址：<http://db.ersjk.co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 Chiu, Hanping. "The Reception of Modernity in East Asia: Japan in China's

- Encounter with the West.” *Tamkang Review* 42, no. 1 (2011.12): 71-101.
- Lowell, Amy. “A Chinese Poem Translated: The Recruiting Officers.”
Translated by Florence Ayscough. *Chung Hwa English Weekly* 6, no.
152 (1922): 530.